



· 读书札记 ·

黄 鹤 楼 神 仙 的 嬗 变

周晓薇 王其祚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自唐代崔颢的这首脍炙人口的《登黄鹤楼》诗吟传开来，不仅令同辈大诗人李白折服，亦使黄鹤楼的名声不胫而走，大噪天下。尤其那跨鹤飞升的飘渺神传，历千百年，几乎家喻户晓，颇为民俗所乐道。这神传的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代，并且从传说的初起到千百年的流变，黄鹤楼头的跨鹤神仙也并非始终如一。借此，笔者特搜排史料，稍事考说，以期为黄鹤楼神仙的渊源嬗变爬梳出一条略趋明晰的线索。

一、无名氏与荀瓌

南朝梁任瓌《述异记》卷上“黄鹤楼”条云：

荀瓌字叔伟，潜栖却粒。尝东游，憩江夏黄鹤楼上。望西

南有物，飘然降自霄汉，俄顷已至，乃驾鹤之宾也。鹤止户侧，仙者就席，羽衣虹裳，宾主欢对。已而辞去，跨鹤腾空，渺然而灭。

这里的荀瓌显然不是“驾鹤之宾”，但与黄鹤楼瓜葛到一起的仙人毕竟出现了这样一位最早的有名有姓者，只是还不曾“跨鹤腾空”罢了。也正由于此，后世还偶有将黄鹤仙指目为荀瓌甚至误认“梁任昉记以升仙事乃荀瓌”者。就这条迄今所见最早黄鹤楼神传，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一点，那就是黄鹤楼的出现及其得名似尚早于荀瓌和那位“驾鹤之宾”的出现，亦即要早于梁朝甚至早于南北朝时期。从酈道元《水经注·江水三》的记载来看，北魏以前黄鹤楼当未出现，故相传始建于三国吴黄武年间的说法不足为据。又根据《述异记》，黄鹤楼之名“自南朝已著”当亦不虚妄，所以应可推测黄鹤楼的出现在两晋至南北朝初。《太平御览》卷48引《江夏图经》云：

黄鹤山，在县东九里，其山断绝，无连接。旧传云，昔有仙人控鹤于山，因以为名。故梁湘东王《晋安寺碑》云“黄鹤从天之夜响”是也。

这里的《江夏图经》大概也是南朝时期的文字，其“昔有仙人控鹤于山”即不云仙人是谁氏的说法正与《述异记》合拍，并且最先露出黄鹤山





“因以为名”的神传消息，从而与《述异记》一起为黄鹤楼神仙传说埋下附会、嬗变与流布的契机。至于所谓“旧传”，尚难明所指；《太平寰宇记》卷112“鄂州江夏县”条亦采此说而作“耆旧传”。又黄鹤楼是因为山、矶而得名，还是因为神仙跨鹤的传说而得名，南朝以至隋唐间的地志图经等史料说法不一，尚难详考。

二、子安

梁萧子显《南齐书》卷15《州郡志》下记载：

鄂州，镇夏口……夏口城据黄鹤矶，世传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上也。

由此，黄鹤楼的跨鹤神仙又出现了一位名叫子安（后世或又谓其姓黄）的。以萧子显后于任昉30年而卒，则《南齐书》当比《述异记》晚出。另外，以子安为黄鹤楼神仙的记载，似乎仅见此一家。子安其人，《列仙传》卷下“陵阳子明”条云：

陵阳子明者，钜乡人也。好钓鱼，于旋溪钓得白龙，子明惧，解钩拜而放之。后得白鱼，腹中有书，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黄山，采五石脂，沸水而服之。三年龙来迎去，止陵阳山上百余年。山去地千余丈，大呼山下人，令上山半言：溪中子安当来，问子明钓鱼在否？后二十余年，子安死，人取葬石山下。有黄鹤来，栖其冢边

树上，嗚呼子安云。

这条记载又见《水经注》卷29“沔水”条，而事迹略有省减。李白《登敬亭山南望怀古赠竇主簿》诗“白龙降陵阳，黄鹤呼子安”，用的就是这个典故。故《南齐书》的记载，当是据《列仙传》及《水经注》附会而来。然而“陵阳”在东，夏口在西，相距甚远，且又不见跨鹤飞升事，所以如果不是《南齐书》有意将子安演变成那位“驾鹤之宾”的无名氏的话，则应该是《南齐书》对此事的误传了。也许正由于是误传的缘故，以子安为黄鹤楼神仙的记载才不多见，且后世主子安说者亦少有。

三、费祎

以费祎为黄鹤楼神仙的传说始于唐代，并且不仅在唐宋间广为流传，亦盛说于后世，殆使荀瓌、子安之事为此湮没。《全唐文》卷400阎伯瑾《黄鹤楼记》云：

州城西南隅有黄鹤楼者，《图经》云费祎登仙，尝驾黄鹤返憩于此，遂以名楼。事列《神仙》之传，迹存《述异》之志。……王室载怀，思仲宣之能赋；仙踪可揖，嘉叔伟之芳尘。

据《三国志·蜀书·费祎传》及《华阳国志》，知费祎字文伟，江夏人，与董允、蒋琬、诸葛亮同为蜀汉“四相”，有“四英”之誉。因此，尽管费祎传中并未有学仙登仙事迹，而凭其字“文伟”同荀瓌字“叔伟”相似，



以及其籍贯“江夏”正乃黄鹤楼所在地这两点，终使费祜这个大人物被附会出来，并且是将荀瓌与子安混合地取代了。自此以后，唐宋诗文载记等咏写黄鹤楼事者遂多约定俗成于费祜身上。《太平寰宇记》卷112“鄂州江夏县”条云：“黄鹤楼在县西二百八十步。昔费祜登仙，每乘黄鹤于此憩驾，故号为黄鹤楼。”并引录了崔颢的《登黄鹤楼》诗。陆游《入蜀记》卷5亦云：“黄鹤楼，旧传费祜飞升于此，后忽乘黄鹤来归，故以名楼，号为天下绝景。”显然，这些主费祜之说的滥觞正是阎伯瑾《黄鹤楼记》所引证的《图经》，而这《图经》盖即《舆地纪胜》卷66“鄂州上景物下”所记“《唐图经》又云费祜文伟登仙，驾黄鹤返憩于此”的《唐图经》，而非前文提及的不云仙人为谁氏的《江夏图经》。关于费祜为黄鹤楼神仙的传说，附会演变得最为神奇有趣的还属明代王世贞《列仙全传》卷9“费文祜”条的记载：

费文祜，字子安，好道得仙。偶过江夏辛氏酒馆而饮焉。辛复饮之巨觞，明日复来，辛不待索而饮之。如是者数载，略无吝意，乃谓辛曰：“多负酒钱，今当少酬。”于是取桔皮向壁间画一鹤，果蹁跹而舞，回旋宛转，曲中音律，远近莫不集饮而观之。逾十年，辛氏家资巨万矣。一日子安至馆曰：“向饮

君酒，所偿何如？”辛氏谢曰：“赖先生画黄鹤因获百倍，愿少留谢。”子安笑曰：“来诒为此？”取笛数弄，须臾，白云自空而下，画鹤飞至子安前，遂跨鹤乘云而去。辛氏即于飞升处建楼，名黄鹤楼焉。

可见此时的费文祜已索性将“子安”用作其字了，而明清以后盛传的黄鹤楼神仙故事人物与情节也从此固定完备了下来。虽说宋明以降亦或有独主一仙及兼采三仙之说者，却毕竟以费祜居了主流，成为黄鹤楼的正统仙主。

四、吕洞宾

明代，黄鹤楼神传的仙主竟又冒出个吕洞宾，使得作为“正经”的费祜与作为“异端”的吕洞宾对立起来。说吕洞宾是“异端”，是因为他根本缺乏做黄鹤楼仙主的深远资历，他的附会瓜葛大致是凭借了这样三个条件：一是八仙的形象与神传已红极于民俗；二是吕洞宾既为道家教主又为八仙首席；三是神魔小说正盛行于当时。把吕洞宾异变成黄鹤楼仙主的恰是晚明时期描写八仙故事的神魔小说《东游记》（见第26回“洞宾斩龙画鹤”），因所述故事乃至细节多与前举《列仙全传》“费文祜”条同，唯仙主姓名互异。经过比勘勾稽，我们发现《列仙全传》与《东游记》所记此事乃同出一源，即金代王朋寿《增广类林杂说》（以



下简称《类说》)卷12“神仙下篇”(未著出处)。大概因《类说》所记画鹤飞升的仙主乃是无名道人,宜其为《列仙》与《东游》各自附会,一正一变,都顺当而不费心力。但是虽说《列仙》与《东游》晚出,却都不如《类说》的故事周详生动,所以迄今所传最完美的黄鹤楼神仙故事还应属《类说》。当然以吕洞宾做黄鹤楼神仙,仅凭前面提到的三个条件似仍嫌不足,仍须向明代以前找寻其渐变的台阶。就笔者所见,大概有这样两重台阶:一是宋代曾有误传写“黄鹤楼边吹笛时”诗句的吕先生(实为“吕元圭”)即吕洞宾。这个误传在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5“神仙

鬼怪”条中虽已指出,但总难免会在民俗中留下影响的。二是元代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45“吕岳传”记载:“一云历江州登黄鹤楼,以五月二十日午刻升天去,不知何年。”尽管还不曾有“画鹤”、“跨鹤”之说,却无疑构成了以吕洞宾附会为黄鹤楼仙主的一大渊源递嬗关系。另外,清代褚人获《坚瓠八集》卷4“黄鹤楼”条亦主吕洞宾说,从故事情节看显然是袭承了《类说》与《东游》的衣钵而更趋简要。唯一的不同是将传统的桔皮画鹤变异成西瓜皮画鹤,并自圆其说道:“始色瓜皮青,久之变黄,遂为黄鹤。”亦别有情趣。

苏轼的幽默

苏轼诙谐成性,他能于最平常的生活中发现耐人寻味的幽默,并通过寓言表现出来。如写“二措大言志”:“有二措大相与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饭与睡耳。他日得志,当饱吃饭了便睡,睡了又吃饭。’一云:‘我则异于是。当吃了又吃,何暇复睡耶!’”寥寥几笔,两人形态毕肖。但苏轼并非仅仅为了“笑”而记,而是于笑中寻求其“味”,故他又在其后评论道:“吾来庐山,闻马道士善睡,于睡中得妙。然吾观之,终不如彼措大得吃饭三昧也。”他是在这些类似笑话的记录中体验人生之三昧。他的另一则寓言“三老人论年”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尝有三老人相遇。或问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记,但忆少年时与盘古有旧。’一人曰:‘海水变桑田时,吾辄下一筹,尔来吾筹已满十间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弃其核于昆仑山下,今已与昆仑齐矣。’以余观之,三子者与蜉蝣朝菌何以异哉!”